

漂泊者

■吴聚平

小姐到哪里

黄昏时,我上了这班公交车,车厢里挤满了人,大都是附近工厂里的工人。

车晃来晃去,走得非常缓慢,一个挨着一个的人和沉闷的空气让人陷入了烦闷的沉默中。快两个小时了,我还没有到达目的地。我是应邀去参加一位多年不见的同学的婚礼。去之前我犹豫了一会,毕竟多年未见,难免尴尬。最终,我还是坐上了这趟公交车。

夜色一点点暗了下来,外面的街灯亮了起来。后来,我把双手吊在头顶的圆形抓手上,不知什么时候就睡着了。

“小姐,小姐!你到哪里?”迷糊中睁开眼,眼前是一位光着膀子的男人,正嬉皮笑脸地看着我。

是他,从一上车就没停过。他和旁座的那位男士一路叽叽喳喳,可能是工友,闹到激动处,甚至动手动脚,弹对方耳朵,动作夸张到不能不使人注意。甚至于,他感受到别人的关注后,带着些表演性质闹得更欢了。

“你到哪里啊?小姐?!”此时他加大嗓门朝我喊。

不知道为什么,我突然感到一阵无由来的烦躁与反感,脱口而出:“到哪里关你什么事!”

这句话像一支箭射向了这个男人,又从他那里反射了回来。

车上的人都看向了我和他。他愣了一下,僵住了,原本黑红的脸此时变得酱紫。过了好一会,才讪讪地别过头去,不再朝我这边看。

他旁边的那位工友像终于抓住什么把柄似的,嬉皮笑脸地嘲笑他:“你看你,你看你,人家到哪里关你什么事呢!”

他望着他的朋友,小眼睛里有一种措手不及的愤怒和委屈:“她睡着了,我不是怕她坐过头提醒她吗。嗤……还戴眼镜呢!”

“嗤”是平舌音,从牙根挤出来的。我终究是什么也没说。他也终于沉默了。整个车厢在夜晚的道路上静默摇晃,像只疲惫的大象。

渔村路时间

渔村路在蛇口的一片民居区和工业园之间,除了上下班的白领,更多的是附近居民。穿过渔村路,不远处就是招商局办公大楼。四十年前,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的正式破土动工,被称为改革开放的一声春雷。到了今天,“时间就是金钱,效率就是生命”的“蛇口经验”已经烙印在每个深圳人的骨子里。

而在蛇口港,在渔村路,这里的时光是更静谧而日常的。傍晚时分,渔船归拢在港口,带来了海滩边鱼鲜市场的短暂热闹,直到黄昏来临,那些渔船附近都升起了烟火。

渔村路对面有一片工棚,依然在搞着建设,每天“叮叮砰砰”响个不停,周围新的楼宇越来越多。楼宇间开始有了一些公司进驻,上下班的职员多了起来。

职员们每天迎着朝阳急匆匆连奔带跑地赶进那些楼宇,到了傍晚,也还是早上的西装长裙、皮鞋高跟鞋,轰隆隆涌了出来,只是脸色普遍都不太好看了,如蔫了的灰茄子。“茄子们”有时候匆匆赶到渔村路尾的公交站台等候,有时候在路边的小吃摊旁停下来。

来一碗凉粉,或者一串鱼丸,让这些简单的食物去除一日的班味,直到脸色越来越平静地融入夜色中。

因此,在靠近工业园的那一片地方,每天傍晚时分都有不少的小贩在那儿摆摊。其中就有一位操

着湖南口音、卖凉面的四十岁左右的女摊主,嘴巴勤、手脚又伶俐,摊前便比其他的那些摊子热闹许多。这位女摊主没有特别的故事,只是十多年来,和丈夫一直靠在外面做小生意维持三个儿女的生活与学习。他们的孩子从小就放在老家靠爷爷奶奶带着,好不容易,大女儿去年大学毕业了,小儿子今年夏天才刚刚初中毕业。她和丈夫早先在渔村路那边摆摊卖些小海鲜,鱼干、虾米、贝肉之类,后来不卖海鲜了,改成水果档,水果平时摆在那里任由顾客挑选,挑好了就拿去打秤结账。

“加多一些面皮,阿姨,再加多几粒花生米呗。”挎着皮包体面而疲惫的职员们常常提出这些额外的要求,女摊主便象征性地用筷子挑了一些面皮加到盒子里,一边嘀咕道:“再加就要加钱啦,小妹!”

到了后来,这位女摊主的旁边又多了一个摊位,是一位中年男人,他把推车停在女摊主的旁边,车上同样摆着面皮和辣椒油,青瓜丝与各色酱油调料。但这男人是始终缄默的,他不像旁边的女摊主那样会起兴头,所以顾客并不多,只有在旁边摊位排队较多的时候,人们才光顾一下他的档口。

但这男的也不急不恼,用近乎谨慎的低谦询问顾客:“您是要凉皮还是面皮呢?”顾客说:“两样各一半来一份吧!”中年男人答了个“好”,便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一次性泡沫饭盒开始装凉皮与面皮,装得满满几乎要溢出来了,又往回挑了一些。顾客加了句:“多加辣椒油,不要葱花。”他又一丝不苟地加了调料拌和起来。

男摊主从老家出来也有几年了,刚开始是他的妻子出来打工,他留在老家。他俩是初中同学,一起骑自行车去学校。几年后他们结婚了,有一个女儿,不久,妻子就和零件厂里结识的姐妹去了特区,听说那里可以赚更多的钱。这个男人只好留在家里照顾父母和女儿。女儿上初中时,男人的父母双双过世了,他便来到城里和妻子会合。想不到团聚不到一年,就在去年冬天,妻子突然跟他提出了分开。最后的结果是他们瞒着女儿分居了。这男人的生活还是一如既往,他白天去一个办公大厦穿起黑色的制服做保安,下班后就弄点小吃买买。

在渔村路路尾转弯处,有一家挂了电话亭牌子的店铺,实际上卖的却是麻辣烫和糖水。门前大树底下排开四张桌子,桌子旁再配两张塑料高腿凳,井然有序。夏夜,一路烟尘从很远的地方回到渔村路的三五百客,坐在那儿张桌子上,喝上一碗银耳糖水,就洗刷掉了一日尘杂。老板夫妇是潮汕人,有三个高度差不远的孩子,一放学了,就在档前帮忙,帮妈妈串菜,给顾客收钱,或是躲进里间写作业。

有时候碰上相熟的老乡来店里光顾,他们多是跟着人手拖,嘴角含根牙签进来,坐下了,开起这老板夫妇的一两句玩笑。虽然是极隐晦的,老板只是默默不语地陪着笑,老板娘却低低地用家乡话像是骂了这几位噪客。

在这时,老板娘的一双大眼睛和额前的刘海便分外生动起来,在努力过活之外,有她小妇人般的纯真风情。

有时,大树底下的桌椅全部搬进了那狭窄的里屋去了,吃客讶异地问:“怎么不放到外面?”

“哪里还敢放啊!凶巴巴地问我‘这个还要不要了?’我说,‘怎么不要!’……”

无数的人们,无穷的远方,既与我有关,又与我无关。

吃客大约知道是怎么回事,便不再问了。

过了十天半个月,糖水店的几张桌椅又照例摆在了店门口的大树下。渔村路络绎的人群如故,他们从这间路尽头的小店铺经过时,都能见到门口晾起的齐整丰富的串菜。齐刘海的老板娘领了她那三个“小校服”在里屋吃饭,四个人围着小桌子,坐得紧紧实实,头都埋了下去,努力扒饭。

火车与少年

清晨六点,好不容易挤上了这列绿皮火车。在我的身后,挤着一个提皮箱的少年,刚进到车厢就端正坐下了,瘦削、黝黑、胆怯,指甲和头发都过长没修。他两手交叉放在身前,腰板挺得笔直,眼神躲闪不定。像是躲避眼前的世界,表情是冷的。小镇四月的早晨有着初春的寒意,清早赶火车的人们呼应着这点寒意,呼呼啦啦往上挤,掀起短时的喧闹,白腾腾一团。

少年在喧闹中坐直了身子,似乎身边的世界与他无关,他不敢过多碰触,只有对远方的幻想。他微微闭上了眼睛,南昌,只出现过在大人们口口念叨的城市,只出现在每天晚上天气预报中的字眼,对于他是个神秘辽远的。这种想象暂时屏蔽了过去生活的屈辱,从小的贫困与苦力活,被父亲呵斥,学校里别扭吃力地背诵24个英文字母最终依然被留堂的难堪。他因为这些而更厌恶学校,它们没有从反面激发少年,他的身上不发生吃苦耐劳的奋斗故事,那些周围人们从 klein 小对他的鞭策如同春风过驴耳。实在被惹急了,才会发出一点蛮凶劲,短时段防卫。

他如今把那一切丢在背后,去往新的世界。南昌城里有个亲戚,电话里答应到了少年去到以后帮忙照应。亲戚家开了个小餐馆,他过去倒是可以帮忙递递拿拿,送个外卖。

少年很快睡着了,他紧依在椅背上,双手插入上衣口袋,脚向前平行紧拢着,即使睡着也保持着紧张。全身唯一自由放任的只剩下那颗头颅,他的头高高仰起,嘴巴无意识地朝着半空中张开,像某种等待哺乳的鸟类,喉结突兀,随着列车的前进触目惊心地耸动着。

坐在少年对面的一位女士,看上去四十多岁,从火车开动起,她便捧着一本书在看。她的卷发都被归拢到头顶一处打了个髻,再用小辫环绕一圈,一丝不剩。橘红的脸,化了淡妆,依然掩不住衰微与小城烟火的气息。

火车开动前,他一直趴在窗口和外面送行的两个女人叙别,那两个女人年纪与她相仿,也许是许久没联系的亲戚,她们的谈话绵绵不尽,似乎马上就要分别这个事实让谈话显得尤其急迫而浓烈,与她同行的男人几次打断谈话,让窗外送行的两个女人赶快回去,可是直到火车开动,那两个女人才依依不舍地离开站台。也许只是出于礼节延长这送别,为此才说了许多话。

她旁边的同伴男子头发有些白了,却还显着活力,对这个世界保持着某种距离的好奇。他主动帮乘客把背包放到了行李架上,然后一直坐在那看书的女人身旁,斜着眼,盯了一会那本打开的书。后来女人放下书,他便从行李架上掏出一袋瓜子,两人一路上磕了起

来,几乎是默契。

到了南昌站,我从这一节车厢里下来,转站搭乘前往P城的车。这次不幸买到了厕所旁的位置,空气不好,鼻子过敏不断打喷嚏。

坐绿皮火车的人大概太无聊,会无休止地吃东西、嗑瓜子。到了傍晚,几乎每一个座位的乘客都抱上了桶装方便面,车厢里充斥着浑浊的酸辣味精气,混合着空气里各种地方上车的人们身上散发的气息,行李的气味、脚气、厕所的气味,熏得人无处可躲,最后成为这气味的一部分,这种气味是绿皮火车独有的。

后来少年们的加入,使得这种气味更加地热烈起来。这是一列从兰州起始的火车,车上有一群年纪还小看上去十五六岁的男孩和女孩,说着兰州口音的普通话,正前往P城务工。这些年轻人嘻嘻哈哈地开着玩笑,吃方便面,青春的气息四溢。

到吉安站时,又上来了第二波年纪相仿的青春背心,这一波年轻人,比兰州上来的那一波更躁动,他们穿着时髦款式的洞洞衣,女孩子拉直的头发放染成了接近栗色的黄,男孩穿黑背心,粗大的链子挂在脖子上,纹身。他们其中的一个男孩与女孩在车厢中打闹了起来,从车厢的一头追到车厢的另一头,全不顾及周围的眼光。另外有一女孩,坐在头发烫成杀马特的男孩的膝盖上嗑瓜子,直直的陈长刘海垂下来,把她的眼睛都遮住了,看不出表情,只偶尔听到“呼哧”一声,是吸鼻子的响声,但丝毫不影响她全神贯注地嗑瓜子。

他们当中的几个男孩专门跑到车厢联接处去抽烟,烟雾缭绕中,开始吹牛。一个说,我出去吃饭从来都是没带过钱。另一个说,我出去坐车也从不带钱。

坐在我对面的,则是两个装扮和气质都和那群孩子不一样的男孩与女孩,他们安安静静地坐着,甚至捧出书在看,一看就是从学校里刚出来的学生。刚开始他们没怎么说话,后来不知怎么地,渐渐聊上了。两人这才知道都是去P城同一所大学面试的考研生。这个发现让他们迅速活络起来,交谈几乎变得热烈。

男孩子圆脸上架着一副眼镜,有几分腼腆,他考的是数学。女孩大眼睛扎马尾,穿一身运动服,笑起来像培训广告牌上的模特一样一脸阳光向上,她考的是英语。他们深切地交流了考研的经过,谈及种种细节。

这是一个伶牙俐齿的女孩,大部分时候,男孩子听她讲。她说自己已经到过P城,那所大学的校园很漂亮。还说明天早上一到最好先去体检,这样可以避免后天的高峰。她自带了热水杯在车上。男孩说,这是他第一次去P城,之所以选择这所大学,是因为那里的研究生每个月有六百元伙食补助。他已经听在P城闯荡的舅舅说了,那边消费特别高,租房子很贵。女孩附和说,那边坐公交都比南昌贵得多,不是上车两元,而是分段收费。男孩这时表现出了深深的担忧,似乎在想着,自己在那座大城市里该怎么生存。

我知道那些憧憬和忧虑都是真实的,他们的未来不就是我的当下。谈到后来,女孩子的话少了,表现出了更多憨憨的可爱,男孩子的话则比先前多了起来。一夜下来,他们已经从刚上车时的陌生

人,变成一对谈话间有点促狭和暧昧的男女,早晨一起下车去找落脚的地方。

如果从上空俯瞰,一列列混淆各种气息和人群的绿皮火车像日夜不息地在大地上腾挪,它们组成了这个国家版图上的一景,幻化成具体的忧虑和希望,一路逶迤,“哐当”“哐当”向前。

聒噪

那时我在一家地产公司做内刊,工作不温不火,做着一些意义不大却能谋生的事情。

一次我和部门的总监赴一个内刊的交流会,路上堵车了,有人烦躁地按着长喇叭,傍晚的夕阳挂在车头。这时,我那位平静温文尔雅的领导突然一反常态,变得聒噪起来,他把方向盘上的右手挪开,扭开音乐按钮,激烈的乐曲瞬间在我们的头上炸开。

他开始说话,不停地抱怨下午公司的会议太长,妨碍了这个交流会。这个交流会是他一个月前就打电话过去招呼过的,后来还跟对方的刘小姐打电话一再确认,协会的会长会出席,某大房产企业的某位领导也会到。

车像块石头似的堵在前后不见首尾的车流中间,岿然不动。我明显感受到了他的焦虑和绝望。

他的话语突然像水流一般往外涌动,怎么也收不住。这时他已经不再抱怨早上的会议,而是开始数落另一位搭档的同事,甚至于公司的制度。到了后来,他开始宣泄他不如意的生活,充满控制欲的老婆、不省心的儿子、糟心的物业。他的抱怨开始变得空洞、重复、俗套,没有任何实际内容,他似乎渐渐上瘾了,丝毫没有注意到旁边的人。

也许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系列的失控。这个自称写过诗的人,开始变得像一位妇人一样唠叨不完。他曾给我看过那些诗,那是一种出于青春激烈的吟诵,稚拙土气,但确实是鲜活的话。也许,凭着年轻时候捞得的一点名声,去交际,慢慢地透支,直到变成一个不自知的人,一个人的内存是在不知不觉中被置换的。

暮春之雨

傍晚时分出发时下起了雨,我像个蚕蛹一样把自己卷在车位上。夜里雨下得更大了,车堵在高速公路,发动机“突突突”发出铁兽的寂寞嚎叫,像被彻底抛弃的动物。

我闭上眼睛,头向左歪,脚大幅度往前面座位底下伸开,像个泄气的“大”字,又缩起来,脱掉鞋子脚盘在座椅上,这样来回折腾,默默地,有冲出这铁兽的冲动。

后半夜沉静下来,脑子开始一点点放默片,把近期缠绕之事放了一遍,放到一些地方就异常清晰,第二天又以以为那是在做梦。一个人虽然消失了,但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,眼前总是有一只蚊子在飞来飞去,在安静地阅读时,塞着耳塞走在大街上时,蚊子浮动起来。在看车窗外飞掠的物体时,和其他人进餐时,网络上聊天时,风干的蚊子飞在周围,用手一抓,却又什么也没有。

第二天中午,天空终于放晴,这时车已过江西边界。窗外都是山,山包围的村庄和田园,屋子就建在田埂边上,小花兀自开,很少见到人,山一笼田一笼之间,偶尔有农人犁田的剪影,有时突然出现一片坟包,飘一些清明的旗幡。

这个时节的油菜花大部分已被雨打风吹去,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车,走在地上也觉得轻飘飘的,

身上还停留着颠簸感。直走到江铃,梯田中间的一个村庄时,才觉得慢慢进入了这片土地。

游客络绎不绝地从景点下来,都要经过江铃。而江铃有自己的性格,不是属于海报上的那个景区。村里的一户人家正在过清明节,女主人站在大锅灶前炒清明茶,男主人则在一旁打打下手,清茶伴着烟火飘出阵阵香气,据说是一年最好的茶。在他们的厨房尽头是一间大厅,厅子的正上方摆着一方八仙桌,桌前供些果品,两旁的山水对联,在松柏仙鹤的挂图映照下,仿佛时代的光阴已经走出很远,唯有这里,还停留在过去的某一个阶段,是现代的桃花源记。

一户门庭前蹲坐着一位老者,围着三个孙辈小孩。他们正百无聊赖地看着来往的游人。屋里厨房正在煮水,奶奶拿了橡皮筋出来,给孙女扎头发,说是过清明节,亲戚小姨要来。

更多的穿红衣服的小孩挤在一间水泥屋前跳绳。我看了一会,这种跳法是我熟悉的童年游戏,两个人把绳子围成一圈,其他人往里面钻。

山脚下的池塘边,旧手帕晾在竹竿上,旁边的祠堂在黄昏中像是被遗弃者,大门梁上“忠贞堂”几个大字若隐若现,墙上刻画的红色语录已斑驳。一位头戴方巾的老人走进了我的镜头,她在祠堂尽头的水龙头前洗着什么,仿佛一个不真实的存在。我要按下快门时,她突然回过回头,对我叫了几句。

这位老人和那些喜滋滋乐于被拍的其他村人是不一样的,她在抗议一个陌生人进入她的私域。

语丝

假期的最后几天,她们都没来,我换了一家超市,人少了,没之前那么累。这两天刮台风,今年湛江的台风似乎特别多。身体停歇下来的时候,思绪便多了。风雨途中,人就容易多思,想到明年就要毕业,从象牙塔里走出去,开始反复想那个不能回避的问题:我以后将要过怎样的生活?

我知道现在是不能马上得出答案来的。

一直以为自己以后想要做的是一个文字工作者,因为文字给我安宁,可以忘我地去投入。然而,一个人仅知描写东西是不够的。我想要燃烧,以一种世俗的方式实现自我,尽管自己现在的力量是多么薄弱。

这个社会有残酷与虚情的一面,从前的我被琐碎生活所羁绊,幻想的情感,惯性地于日常衣食,敷衍式的情,视野囿于狭小的空间。现在慢慢地,我看到了更多以前看不到的现象。可是看到了之后我又将怎样呢?我是否有勇气去在现实里坚持那些东西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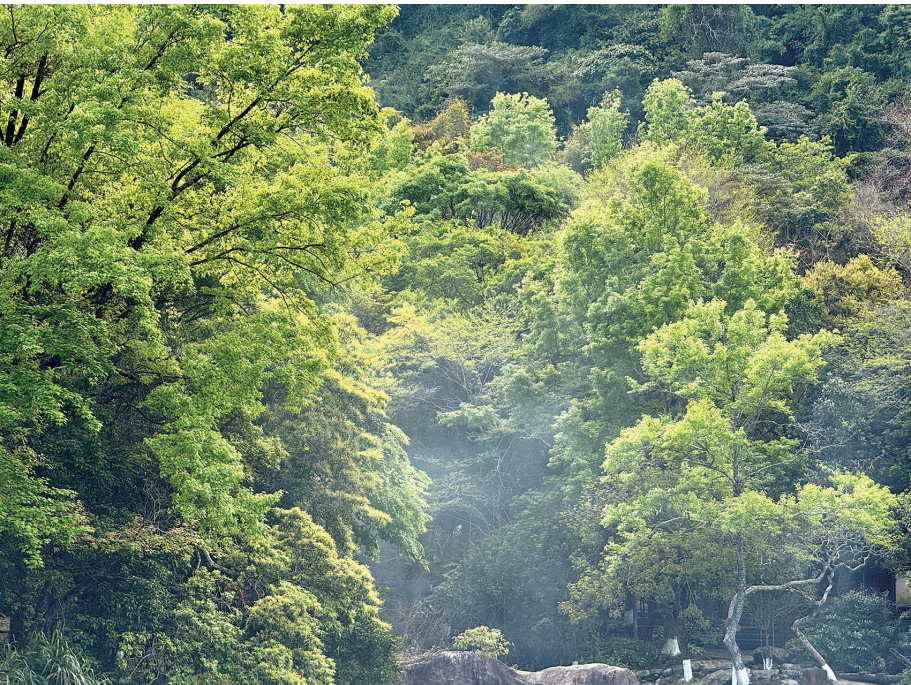
或许每个人都有两个空间,内层与外层。外层是一目了然似的,面对人与人的纠缠。内层空间则是寂寞而丰腴的。文字是打开内层空间的钥匙。要想在外层空间获得入场券,好像必须花大量的时间去做你未必愿意做的事。

如果我不能在外层空间里强大起来,大概也不能在世俗里平衡自己。而当有一天,我不能感受,不能思考的时候,便会在里层的世界里灭亡了,随波逐流,或许得到了什么,但思想与灵魂是沉睡了的。

车窗外此刻是雨打风吹,一片模糊视野。哪一天,我的世界豁然开朗,能够望见云层、泉眼、星空,望见时风吹过秋刀鱼变化石,望见尘世,也望见内心的明亮。



■老屋·春光 吕嘉玲 摄



■春之绿 吕嘉玲 摄